

毛·泽·东·思·想·研·究·从

新民主主义 革命思想的开端

湖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新民主主义 革命思想的开端

徐义君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开端

徐义君 著

责任编辑：黄治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3,000 印张，13.625 印数，1——6,900

统一书号，3109·515 定价，(平装)2.75元 (简装精装)3.05元

目 录

1

第六章	在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前蔡和森“以暴动对付暴动”的策略方针	(267)
一	“以暴动对付暴动”策略的内容	(267)
二	“以暴动对付暴动”策略的正确性	(276)
三	“以暴动对付暴动”策略方针的局限性	(294)
第七章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299)
第一节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地位思想的酝酿	(305)
第二节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地位思想的基本形成	(347)
第八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基本形成	(379)
第一节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380)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探索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	(396)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的理论探索在科学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415)
结束语		(427)

绪 言

近来，学术界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基本形成问题的研究相当活跃。它涉及这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关于革命领导权、农民与土地、统一战线与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总的来看，研究工作侧重于单个问题。对单个问题的研究是深入研究所必须的，但是如果仅仅局限在单个问题的研究上，是不能适应研究工作发展的需要的。研究工作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在进行对单个问题的深入研究的同时，也进行对有关各个问题的综合性的研究。这样有助于更好地揭示有关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当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决不是拙作所能胜任的。然而笔者有志于在这方面作一个尝试，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完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开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找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作了基本的规定。抗日战争时期，党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完整而系统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論、路线、方针、政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論、政策发展得更为完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的第一个时期，又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自我党建立前后起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前，是第一个阶段。这是我党酝酿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党初步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始明确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初步制定了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在酝酿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上有了重要进展。自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到一九二七年七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是第二个阶段。这是我党初步形成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时期。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五年冬至一九二六年，首先形成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通过对我党自建党至“一战”时期理论探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 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是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基本条件

(一)认识中国革命规律，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并胜利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自党诞生起，即开始了这一过程。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建党初期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这一过程的初步的也是重要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与实践，是我党在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确实离不开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离不开我党同志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列主义的运用与创造。理论联系实际

这一重要的原则，在当时我党一些重要领导人中，就已开始予以重视。正如蔡和森在“一战”中期所说：“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但党的理论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短时期可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①

推动先进人们寻找革命真理的动力，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运动，中国人民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强烈愿望。这一过程，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中国人民只有在找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后，才能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着手有效地从事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我党一些重要的创始人与领导人强烈地感受到革命理论对于指导革命的重要意义。他们不满于当时已在社会流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而是进一步追求比这更高的文明。这一动机是那样的强烈、不可阻遏，导致了学习、传播马列主义的热潮的出现。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所能找到的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还有相当一批青年利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到外国学习。共产主义者即使被投入监狱，也不中断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它与反动思想进行了三次大的论战。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

①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1页。

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的形成，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

马列主义的哪些重要原理在我党理论探索中发生了重要指导作用呢？主要是关于时代特征、革命对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策略、革命领导权等方面的理论。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南、以中国革命实践为依据形成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关于中国革命的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在马列主义的文献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马列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但它并没有为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提供具体的结论；只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以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的理论作指导，才能逐步认识中国革命的固有规律。

在我党建党和“—战”时期，我党尚处于幼年时代，学习、宣传、实践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使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理论与实际，毕竟是理论先行，才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当革命者对马列主义毫无所知或知之不多时，是谈不上马列主义与革命实际的联系的。我们首先看到一个个革命志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由他们集合组成中国共产党，才看到一系列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过程。因而在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个历史时期，有那么一个阶段，即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期间，历史赋予的任务是首先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造就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就努力用马列主义原理剖析社会、指导革命，取得成绩。但是，这是有限的。他们的主要功绩，就是由国外引

进了马列主义理论。他们在开始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实际时，出现许多幼稚的、几乎可以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的错误。然而，从来没有人这样指斥过他们。因为他们正是相当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在那样短的时间里，把自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列主义成为“三次论战”的胜利者，广泛传播了马列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了理论的、组织的必要条件。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是一定能逐步加以解决的。党的“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着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开端，正如李达所说：“这样看来，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①。因而我们决不应该以建党前后那段时间理论与实际联系得不怎么好，就低估当时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甚至把这个阶段与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总过程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该把这个阶段的理论工作，与我党马列主义理论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总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作为这总过程的第一个阶段。

从形式上看，建党时期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某些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某种类似之处，即都未能联系中国实际，未能适合中国国情。但是二者是有重大区别的。主要区别是：“二战”时期某些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

① 《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上”。这样的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①。这样学习马列主义，无助于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指导革命运动。建党时期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那时绝对没有上列现象，但是应该说，那时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基本态度是为了救国救民，解决中国问题而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他们真诚而热烈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了一些就企图以它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他们很以为只要照着马列主义书本上写的那样去做，就能解决好中国问题。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一九一九年八月李大钊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②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时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③据有关回忆，在党的“一大”中，多数代表并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这种在学习马列主义过程中的求实态度，使得他们能较快地突破理论和实际脱节的状况，逐步使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中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并用以指导革命。

党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后，必须进一步解决革命动力、策略、领导权等问题，形成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基本认识，正如瞿秋白所说：“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是很急切地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97、800页。

②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页。

③ 《党史研究资料》总第29期，第32页。

题。”^①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是酝酿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时期，为了使我党同志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有效地探索中国革命规律，党中央提出了“提高党员之理论认识”的口号。党组织在此前后分别在上海开设“上海书店”，长沙开设“文化书社”，湘潭开设“湘潭书店”，南昌开设“明星书社”，广州开设“国光书店”，潮州开设“韩江书店”，太原开设“明星书店”，安庆开设“新皖书店”，青岛开设“青岛书店”，海参崴开设“五一书店”，重庆开设“新蜀书店”，宁波开设“宁波书店”等等，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党的刊物等。一些党组织能定期开党员大会，学习马列主义，如湖南区委安源地委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制定《教育宣传进行计划》规定：“每月须召集党员大会一次，讲演时事或主义及本党政策诸问题。”^②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特作《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四大”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决定在党内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集中力量办好《新青年》，同时要加强《向导》、《中国工人》和《党报》（秘密党刊）的工作，使其成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还提出设立党校、工人补习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以便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教育。为了扩大马列主义的宣传，“四大”还决定在中央宣传部下设立编译委员会。

党员在繁忙的工作中，有时是存在放松理论学习的现象的。党注意到这个问题，采取纠正措施。一九二六年七月党中央第

①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页。

② 《安源地方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二～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三次扩大会议，指出党员中“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①。这次会议决定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宣传工作应当赶紧整顿”。会议对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给与相当重视，要求加强党校工作，加强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等^②。

党在“一战”时期之所以能初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形成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党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使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初步结合的结果。

(二)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必须以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依据。

中国革命的规律，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要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只有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

自建党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经历了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二月的工人运动高潮，一九二五年五月至八月的五卅运动，和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二七年七月的北伐战争。这三次革命高潮对于我党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初步显示了我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体现了它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京汉铁路罢工的被镇压，工人运动的转入低潮，表明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并组织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这些都是中国民主革命中带规律性的现象，在运动中得到

① 《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二～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7～599页。

了首次体现。当然，这些带规律性的现象的表现，还是初步的，不甚明显的。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从这次工人运动中看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但是也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后，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抱消极、悲观态度^①。他们不是由此更加坚信和依靠无产阶级，反而轻视无产阶级，而倚重资产阶级。

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到五卅运动之间，是工人运动的低潮和逐渐复苏的时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一九二四年五月我党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之后，工人运动逐渐发展起来。这时，国民党右派已开始对我党进行攻击，其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共合作，限制我党力量，争夺领导权。广东海丰一带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发展起来，初步显示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也都是中国民主革命中带规律性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所表现的民主革命的规律性，还是不甚明朗的。那时工人运动仅仅开始复苏，尚未形成大的声势；国共合作方才开始，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比较好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还不明显；农民运动仅局限于广东少数地区，影响也不大；等等。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全党范围内基本上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即形成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确实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在认识中国革命规律中是有进步的，但是还不能认为“四大”已经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五卅运动是一次在我党领导下的、以无产阶级为主力的、

①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民族革命风暴。在五卅运动中爆发的广东省港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上海、广州、香港和各地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曾经参加这场反帝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明显地暴露出其两面性的阶级属性。相形之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与伟大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不能比拟的。这次运动中和运动后，资产阶级震惊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对无产阶级发起大的攻击。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出笼。国民党右派在西山会议、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等一系列反动事件中，给我党和革命势力以强烈攻击。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表现得相当充分。农民运动已经不仅在广东，而且在湖南等地发展起来。民主革命中带规律性的现象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以此为背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五年冬至一九二六年，开始形成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当然，这一思想要成为全党的思想还有一段距离。

北伐战争是在我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针的指引下、以我党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运动为基础、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发动的革命战争。这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在北伐战争中，中国革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阶级属性进一步充分地表现出来。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发展到十分剧烈的程度，以至蒋介石集团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民族资产阶级也跟着背叛了革命。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已在部分共产党人中初步形成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又有所发展。

整个“一战”时期，尚无土地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因此不具备认识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基本条件。

总而言之，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必须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作为依据。这两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行的。在建党时期，由于党可以说毫无实践经验，尽管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有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强烈愿望，也是不能形成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的。并且，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严重欠缺时，也难以形成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基本的认识。但是，只重视实践经验，不重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也不能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对待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总结实践经验，从中形成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认识。另一种态度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即不认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实践经验。因而在同样的历史事件面前，人们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形成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另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以他对中国革命规律的错误认识——“二次革命论”作为理论依据的。

共产国际在我党建党时期与“一战”前期（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对我党的帮助较大，而在“一战”中期（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党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之前）后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党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之后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对我党的帮助就不如前期了。这是由于在建党时期与“一战”前期我党严重缺乏民主革命实践经验，而共产国际则有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验、殖民地

与落后国家（如印度、印尼等）民主革命经验。那时具体帮助我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统一战线策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要是根据他在荷属殖民地爪哇的革命经验。但到“一战”中期、后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了较为丰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验，而且有了处理统一战线中与资产阶级关系的经验，而共产国际的指挥中心则远离我国，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在这些时间，共产国际对我党虽然仍有帮助，但是也犯了不少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已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超越了共产国际。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是完全合理的，它说明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必须具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为依据这两个条件。

二 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主要标志，是初步形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思想

在建党时，我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基本认识是不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党的“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应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然后无产阶级举行社会主义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党的“一大”和“二大”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一大”的认识经历的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二大”的认识则为时较长，影响较大。后来陈独秀将它发展为系统的“二次革命论”。从党的会议的认识来看，直到一九二六年中的